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俄〕普列汉诺夫 著

王荫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10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ОЛИ ЛИЧ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И

本文选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第 2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俄)普列汉诺夫
著;王荫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7291-5

I. ①论… II. ①普…②王… III. ①人在历史发展
中的作用—研究 IV. ①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94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俄〕普列汉诺夫 著
王荫庭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291-5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译者序

1898年,普列汉诺夫以基尔桑诺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的俄文科学和社会政治刊物《科学评论》杂志第3、4期上发表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这篇论著是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在19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反对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略思想斗争的又一传世佳作。这是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这个问题最全面、最完整的分析,也是唯一的专论。其后一个多世纪,人们相继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也确实有许多进展,但整个看来,或者说,从一般原理的高度来看,实质上并未取得重大突破。至于思想之精辟,史料之丰富,论述之透彻,语言之洗练,以及风格之卓异,在同一主题的论著中,这篇篇幅不大的名作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也因此,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即使极“左”思潮泛滥,对普列汉诺夫政治上大张挞伐,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也仍然一直把这篇著作列为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必读的共产主义教材。

普列汉诺夫在这篇专论中批判了三种错误思想,即英雄史观、无为主义(或宿命论)和“因素论”。从一般哲学意义说,英雄史观属于唯心主义理论,无为主义作为庸俗社会学反映了机械论的特点,而因素论则是多元论或折中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三种



错误观点中他批判得最多、最全面、最详细的是英雄史观,而且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不是黑格尔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因为当时正是前者疯狂地从事“个人恐怖”和“以行动作宣传”之类的政治活动严重地阻碍了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过在个人的历史作用学说史上总的说来一直存在着的主要是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杰出人物的作用。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乎规律的必然过程,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即主张所谓“英雄造时势”。另一派则过分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贬抑甚至抹杀个人的作用,即认为“时势造英雄”。两派的共同特点是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同个人的自觉活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找不到联系两者的桥梁。普列汉诺夫在批判这两种观点时,不仅提供了新颖独特、分析细致、令人信服的论据,从而通俗有力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不仅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有关的“合理内核”,如所谓“内在精神”、“普遍精神”、“理性的狡黠”等思想,而且从这一学说和这些思想出发,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凡是讲到个人的历史作用时,一般都是指杰出人物或伟大人物,即杰出的或伟大的人,至于普通的平凡的个人,他只是简单地认定他们在历史上不可能不起作用,或者从道德的观点上断言:“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倡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



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见本书边码Ⅱ334)

在个人作用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理论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他把社会的发展分成两个层次,即“一般趋势”,或“总的趋势”,或“一般规律”,和“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从而提出这样一条新的基本原理:杰出人物只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个别外貌,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后者是由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因(如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等)决定的。

这一基本原理的提出,彻底解决了“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这样两种历史上长期对立的观点所产生的种种纠缠不清的问题。他指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看,英雄不可能造时势,只能是时势造英雄,但从社会发展的个别外貌看,杰出人物完全可以、而且历史上常常创造出深深打上自己特有印记的时势,因为他们可以加速或延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进程,可以决定这种事件实现的方式,可以使事件的固有方向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可以“凭借自己占优势的力量使得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种种力量的混乱的波动具有规范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见本书附录第二十一条),从而在决定事件的各种势力的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改变历史的进程。

在历史上,人们总是首先认识到事物的“外貌”,即表面现象,然后才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或“一般规律”、“一般趋势”。所以,和其他许多历史上相对正确但有自己的局限性或严重错误的理论一样,“英雄造时势”理论这一历史上长期广泛流传的英雄史观,远不是人们所批判的那样百分之百的错误,一点合理因素都没有。相



反,它在个人的历史作用学说史上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是这个学说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把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一基本原理再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说,不能把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和一般趋势视为一成不变。实际上,个别外貌和一般趋势的对立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可变的。对于一流杰出人物是局部后果的那个影响范围中的某一部分,对二流杰出人物说来很可能属于一般趋势。比如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如果列宁在彼得堡遭暗杀成功,而改由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如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或斯大林)来领导,革命都可能很快归于失败。人物越是杰出,局部后果的范围就越会向一般趋势那个范围伸进。反之亦然。因此历史学家在具体分析特定历史人物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善于分辨一般趋势在哪里结束,而个别外貌从何处开始。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观中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问题之一,也是当年轻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我们把这篇 30 多年不曾再版的专论重新翻译出来,供读者参考,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其中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者对上述专论中的某一问题或某些问题作出了重要补充或详细分析,特别是对 18—19 世纪西欧哲学和社会学中相关学说和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为了让读者全面、充分地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我们从他的、已有中译文的其他所有著作中摘录了几乎全部重要的相关论述,共四十一条,作为本书附录。其中



除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条因一时借不到俄文原著(《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1、22卷)无法校对外,其余各条或由我翻译,或经我校改。所有我译、校的文字如有错误,均由我负责,并望方家不吝指正。读者如希望更多地了解本书译者对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观点的看法,可参看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七章前五节。在那里,作者对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作了简要然而系统的述评。

专论的注释有三种:一种是普列汉诺夫原注,以阿拉伯数字“①、②、③……”表示;第二种是“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注,以阿拉伯数字“[1]、[2]、[3]……”表示;第三种是由译者所作的注释,以*、**、***……表示。在重新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20世纪7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单行本。

最后,本书的全部稿件都是李清贤女士帮忙打印的,谨致谢忱。

王荫庭

2009年8月于南京



目 录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一	3
二	8
三	14
四	19
五	24
六	34
七	45
八	51
附录	58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146



[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写了一篇文章: II 300*《理性和情感是进步的因素》^[1]。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宾塞,证明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则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从属的作用。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2]反驳了卡勃利茨,对于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讽意味的惊讶。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保卫理智,自然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问题的实质,而是指明问题提法本身如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许,他就较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已经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任意地划分出社会生活的



* 罗马数字 II,指《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选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第 2 卷;阿拉伯数字是指该卷页码。——译者

** 卡勃利茨(1848—1893),又名尤佐夫。俄国政论家,作家,自由民粹派最右翼代表之一。著有《社会学概论·民粹主义原理》。——译者

[1] 卡勃利茨这篇文章 1878 年发表在文学政治报《星期周报》第 6、7 期合刊上,1882 年编入卡勃利茨主要著作《社会学概论·民粹主义原理》。

[2] 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勃利茨的文章发表后,米海洛夫斯基立即在自己的《1878 年文学评论》中对它做出了反应(参阅《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 4 卷,1897 年圣彼得堡版,第 539—546 页)。

***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是俄国主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各个不同方面,并把它们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使它们变成从各个方面和以不同结果吸引社会人走上进步道路的特种力量。然而这个理论就其在卡勃利茨那里所获得的那种形态说则更加没有根据,因为卡勃利茨已经不是把社会人活动的这一些或另一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领域变成特殊的社会学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已经十分显然的谬论的滑稽可笑的世界。这才是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本应让卡勃利茨和他的读者们加以注意的地方。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在揭示企图发现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进了怎样复杂难解的抽象领域时,也许会无意中为批判因素论本身作出某些事情。这在当时对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然而他并不足以胜任这个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对折中主义的爱好,由于折中主义,一切“因素”在他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他的思维方式的折中主义性质,后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攻击上,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一切其他因素并且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连想也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因素”观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1]作辩护的。不过应当指出,“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过失一点儿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其

[1] 无为主义是17世纪末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神的意志。由此产生漠不关心地、神秘直观地对待生活,消极被动,“不反抗罪恶”等等的宿命论说教。

他人犯这种过失……

当唯物主义者还没有制定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时,人们早就开始指责他们有“无为主义”倾向了。我们不必追溯“远古”,且回忆一下著名的英国学者普利斯特列*同普赖斯**的争论^[1]。普赖斯在评析普利斯特列学说时曾附带证明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相容,证明唯物主义取消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援引生活经验。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无疑的,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跃、最无生气的动物(I 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不过我要问问您,您在哪里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学说的人士中间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精神来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当时所谓 christian necessarians^①[基督教必然论者]^[2]的宗教民主派。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为的那样活跃。不过这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



* 普利斯特列(Priestley, 1733—1804),英国化学家,神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决定论者。著有《普赖斯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学说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辩论》(1778年)。——译者

** 普赖斯(Price, 1723—1791),英国分离派宗教家,道德哲学家。——译者

[1] 同普赖斯的争论,记载在普利斯特列下述著作中:《普赖斯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学说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辩论》,普利斯特列博士还补充了说明辩论本质的绪言,和几封致某些参加过这次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辩论的作家们的信》,伦敦,1778年。

① 18世纪的法国人对唯物主义同宗教教义的这种结合会很惊讶。在英国,任何人都不会对这种结合觉得奇怪。普利斯特列本人就是很信宗教的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

[2] 基督教必然论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认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从事活动的。

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朗松*说,“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原则上都确信意志的无能为力;它们否定自由和使世界屈从于宿命论”^①。朗松是不对的:他以为对所谓意志自由的任何否定都会导致宿命论;但是这没有妨碍他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的确,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础。拿清教徒^[1]为证,清教徒的毅力就远远超过17世纪英国一切其他党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们为证,他们在短时期内就使从印度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都服从自己的权力。那些认为只要我们确信特定系列事件必然到来,我们就会失去促进或反抗它们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错误的。^②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

* 朗松(Lanson, 1857—1934),法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著有《法国文学史》。——译者

① 参看他的《法国文学史》,俄译本,第1卷,第511页。

[1] 清教徒,指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和苏格兰拥护加尔文主义的那些人。他们在17世纪为准备和实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巨大的作用。

② 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的学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Prædestinationem vocatur æternum Dei decretum, quo apud se constitutum, habuit quid de unoquoque homine fieri valet. [我们把上帝永远决定的事情,把上帝对自己规定的、因而对各个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称为预定。](Institutio, lib. III, cap. 5[《训条》,第3册第5章])正是按照这个学说,上帝从自己的仆人中挑选几个人来解放受到非正义压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就是如此。从一切情况看来,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终,而且大概是由于完全真诚的信念,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意志的产物。所有这些行动对他来说都预先涂上了必然性的色彩。这不仅没有妨碍他企图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使他的这一企图获得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 关于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传说,详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译者



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而且这种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这个位置，便不能不这样]来表示的那种心绪，而且由于这种心绪，人们表现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实现最令人惊异的勋业。这种心绪是哈姆雷特没有体验过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唉声叹气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那主张自由只是已经转化为意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得对：“一个人怎样，他的哲学也就怎样。”



我国有些人对施塔姆勒*的话信以为真,认为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似的。我们指的是他的月蚀例子。实际上这是最荒诞的例子。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结合在一起的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内,而且光凭这一点,就只有疯人院里才会产生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如果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内,那么凡是很想看到月蚀,同时确信月蚀不用他们促进也一定会发生的人,都不会加入月蚀党。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避免多余的即无益的行动罢了,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要使月蚀的例子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场合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对上述政党来说本来应当把这个例子根本改造一下。应当设想,月亮是天生有意识的,并且它受蚀时在天空中所占的那个位置,在它看来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同时这个位置不仅使它得到巨大的享受,对它的精神安宁说来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始终充满热情地力求占住这个位置。^①作了

* 施塔姆勒(Stammler, 1856—1938),德国法学家,新康德主义法学派代表。——译者

①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amment de quelque autre cause, 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s insensibles de la matière magnétique. Leibnitz, *Théodicée*, Lausanne MDCCCLX, p. 598. [“这同磁针对转向北方感到高兴,认为它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不依赖任何原因,而觉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莱布尼茨:《神正论》,洛桑,1760,第598页]



这一切设想之后,理当问问自己:如果月亮终于发现,实际上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而是相反,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它会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见,结论是:只要月亮没有借助于某种逻辑矛盾而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发现一定会使它不能运动。但这个假设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种发现也许会成为月亮情绪不佳、精神失调、它的“理想”与机械现实发生矛盾的正式根据之一。但是既然我们假定“月亮的心理状态”归根到底整个地全都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么本来也就应该在运动中去寻找月亮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细心地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情况会是这样的:当月球处于远地点时,它为它的意志不自由感到难过,而在近地点^[1],这种处境就成为它心情快乐精神焕发的新的正式来源。也许结果恰好相反:也许会是这样的,月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发现自由和必然相协调的方式。然而不管怎样,无可怀疑的是这种协调是完全可能的,必然性的意识同实践上最坚毅的行动是相处得非常好的。至少历史上迄今为止常有这样的事。否定意志自由的人,就其意志力说常常超过自己所有同时代人,并且对自己的意志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大概施塔姆勒只有在故意不愿意看到真实的历史现实时忘记的那样才会忘记这些例子。这种不愿意例如在我国主观主义者^[2]和某些德国庸人那里是很强烈的。然而庸人和主观主义者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会说的纯粹的幽灵。

11304



[1] 近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近之点,远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远之点。

[2] 俄国主观主义者,社会学中主观方法的拥护者,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等人认为,在建立社会科学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应该不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而是所欲望的东西、“理想的东西”等等的标准。

我们且仔细地看看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行动始终具有必然性色彩时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样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仑一样自认为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命运所选定的人物,或者像 19 世纪某些社会活动家一样自认为代表谁也无法遏制的历史运动的力量,他就会表现出几乎自发的意志力,像摧毁纸糊的房屋那样,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1]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碍一扫而光。^①不过这个场合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我不能破坏自由跟必然的这种同一性;我不能使它们互相对立;我不能感觉到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现。

西梅尔*说,自由总是摆脱什么东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为

[1] 普列汉诺夫这里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西格里县的哈姆雷特》。

①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这类人的情感多么强烈。费拉尔公爵夫人勒索(路易十二的女儿)在给自已的教师加尔文的信中写道:“不,我没有忘记您写给我的那些话:大卫对上帝的敌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会持另一种态度;因为如果我知道,国王,我的父亲,和王后,我的母亲,和已故的先生我的丈夫(feue monsieur mon mari),以及我所有子女被上帝抛弃了,我就会以不共戴天的仇恨憎恨他们,并且希望他们下地狱”,等等。怀有这种情感的人能够表现出何等可怕的无坚不摧的毅力啊!要知道这些人都否定了意志自由。

* 西梅尔(Simmel, 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译者

